

# “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

欧阳跃峰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 所有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几乎都有康有为于1895年5月2日发动“公车上书”的记载。虽曾有人提出异议,却未引起重视。事实上,康有为虽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至都察院上书。康梁等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关键词] “公车上书” 编造 历史神话

## A Historical Myth made up by Kang Youwei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ooks, almost all of them mentioned the “Gong Che Shang Shu” launched by Kang Youwei on May 2, 1895. Some scholars have put out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t, but nobody takes this seriously. In fact, although Kang Youwei wrote a letter to emperor, no Ju Ren signed their names on it, and the letter also was not sent to Du Cha Yuan. So this event made by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intend to raise Kang Youwei's role in Wei Xin Movement.

**Key Words:** “Gong Che Shang Shu”, make up, historical myth

“公车上书”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通常特指《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策划的举人联名上书。所有的中国近代通史,都将其作为重要史实加以记叙,认为康有为于1895年5月2日发动一千三百余名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清廷,因都察院借口《马关条约》已经签字<sup>①</sup>,拒绝接受而未能上达<sup>②</sup>。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sup>③</sup>,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后出版或重版的有关著述,照旧沿用原先的说法而未作任何更改,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这段史实,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上述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该年谱记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公历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字卓如)鼓动各

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一夜草万言书……至四月初八日(公历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又说:“初六七连日大集……至初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

① 事实上李鸿章早已代表清政府于4月17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这里指的是光绪皇帝于5月2日批准该条约。

② 参见李侃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4月第4版,第242~243页。其他各书记载基本雷同。

③ 参见汪叔子、王凡:《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载《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二章第二节,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版。

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孙毓汶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sup>[11]</sup> 四, p. 130) 其实,康有为的这段话是多处掺了假的。

据刊印《公车上书记》的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为该书所作的序言称:“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各省举人分别联名上书,“书上数日不报。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康有为号长素)者……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是日……松筠庵坐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谕用宝之举……是夕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殒然矣,议遂中寝”<sup>[11]</sup> (p. 154 ~ 155)。就是说,康有为起草上书完稿后,原拟召集各省公车,于5月1日至3日在松筠庵连续开会三天,让大家传阅、讨论并在上面签名,而后于5月4日集体至都察院呈递的。按道理,签名应在经过传阅、讨论,大家没有异议之后才会进行,但5月2日至松筠庵开会者已仅剩“数十百人”,5月3日已没有人再到松筠庵去了。显然,传阅、讨论的程序尚未完成,签名的手续更未及履行,至都察院集体上书之议因而遂告“中寝”。

康有为的弟子徐勤专为吹捧康有为而作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也说,上书“属草既定,将以初十日就都察院递之,执政主和者恐人心汹汹,将挠和局……遂于初八日趣将和约盖用御宝,同人以成事不说,纷纷散去,且有数省取回知单者,议遂散”<sup>[11]</sup> (p. 132)。其中原订于5月4日至都察院上书、松筠庵会议于5月2日夭折、部分公车“取回知单”等内容,与未还氏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根据他们的记载,康有为确曾预谋发动“公车上书”,但事实上由于各省公车并未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名,“上书”亦因而流产了。在此之前,虽有部分公车分别联名上书,却与通

常所说的“公车上书”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历史上根本不曾发生过如同许多史书所描述的“公车上书”事件。

未还氏的序言写于1895年5月;徐勤的杂记曾编入《南海先生四上书记》,由上海时务报馆石印,其撰稿时间不会迟于1896年。尽管他们二人与康有为的关系非同一般,康有为也确实在利用他们抬高自己,但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事态的发展尚不明朗,康有为还不可能想到要重新编造这段历史,他们的有关记载还是依据史实的,也基本上是可信的。康有为自编年谱系戊戌政变后康逃亡日本期间所作。当维新运动成为过眼云烟之后,康有为得以静下心来认真地回顾这段历史,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自己维新运动领袖的形象。于是,他居然无视已有的记载,硬是把松筠庵会议的时间提前到4月30日和5月1日,把上书的时间由5月4日提前到5月2日,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而其“发起人”的身份又使人不敢轻易地怀疑其记载的真实性,于是便形成了流传多年的错误说法。

其实,只要细心考辨,便不难发现,康有为编造的这段历史,还有多处露出了马脚。

首先,康有为说,他起草的万言书曾于5月2日投递,“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而他的弟子梁启超则曰,该上书“言甚激烈,大臣恶之,不为代奏”<sup>[11]</sup> (p. 297),意思是说都察院收下了康的万言书,而不愿转呈皇上。二者明显矛盾。事实上,都察院自4月22日起,即陆续收到了各省公车的联名上书,“初难之,故迟迟不上”,后因文廷式弹劾该衙门“壅上听、抑公议,上命廷寄问之”<sup>[12]</sup>,都察院才转变了态度,于4月28日后逐日将收到的上书及时上呈,5月2日一天就转呈了15件条陈,其中包括各省举人的联名上书8件,直至5月9日还代递了分别由江西举人罗济美、云南举人张成瀛领衔的两份上书<sup>[3]</sup> (pp. 84 ~ 85)。如果康、梁等真的曾于5月2日至都察院上书,都察院是绝对不可能“却不收”或“不为代奏”的。

其次,康有为说,4月15日李鸿章“电到北京”,他就先知道割地赔款的消息了;而未还氏却明明说是马关签约(4月17日)后,电至京师,才“举国哗然”

的。二者亦不相符。据查证,马关议和期间,日方于4月1日提出媾和条款<sup>[4]</sup>(p. 476),于4月10日提出条约修正案<sup>[4]</sup>(p. 489),李鸿章都于当天电告了总理衙门,此后虽仍逐日向清廷汇报谈判情况,却再未逐条开列条约内容,康有为根本不可能从4月15日到京的电报中获悉条约都有哪些具体条款。另外,中外议和事关机密,朝臣多未知晓,康有为当时不过是一名应试的举人,何以能够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两天“先知消息”?假如他果真于4月15日最先了解到议和的内幕,并当即令梁启超发动各省公车上书,为什么直到4月22日才有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上书?他本人为什么要迟至十余日后才开始起草上朝廷的万言书?康有为把自己获得消息的时间提前,无非是要抢占发动公车上书的头功。

再次,康有为说,5月2日各省公车“有请除名者”,欲给人造成一种他们已在其所拟万言书上签名的错觉;而未还氏和徐勤都说他们仅仅是要求“取回知单”,这足以证明各省公车尚未在万言书上签名。事实上,康有为等在签名及人数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造假过程。起初,未还氏说康有为“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徐勤说“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拟上一公呈”<sup>[1]</sup>(三,p. 132)。甚至连康有为自编年谱所说,“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开会,与名者千二百余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sup>[1]</sup>(一,p. 296~297),都清楚地说明是开会的人数,而非联名上书的人数。后来,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提及:“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sup>[1]</sup>(四,p. 11);在《三十自述》中曰:“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sup>[1]</sup>(四,p. 45);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有为当中日战后,纠合青年学生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sup>[1]</sup>(一,p. 440)。不但人数直线上升,而且语意也含混不清了,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联名上书的人数。康有为《汗漫舫诗集》<sup>①</sup>内有“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句<sup>[1]</sup>(四,p. 338),且附有文字说明:“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sup>[1]</sup>(四,p. 337),始

明确地把这3000人都说成了在万言书上签名者。

此外,《公车上书记》附录有一份“公车上书题名”,翦伯赞《戊戌变法书目题解》指出:《公车上书记》“书后附签名者六百零三人,其籍贯包括十六省”;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作十八省千二百余人,与此书所载不同”<sup>[1]</sup>(四,p. 583)。各省公车既未在万言书上签字,这份名单只可能来自松筠庵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鉴于曾有部分举人“取回知单”,而现存的名单中又确实没有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台湾、奉天、黑龙江、新疆、蒙古等省区的举人在内<sup>[1]</sup>(二,pp. 155~156),参加松筠庵会议者总共或许不止603人,但是否能多达一千二三百人,也还有疑问。

【收稿时间】2002年8月

【作者简介】欧阳跃峰,男,1955年生,安徽来安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参考文献:

- [1]《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
- [2]文廷式:《闻尘偶记》。
- [3]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 [4]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① 翦伯赞《戊戌变法书目题解》曰:“汗漫舫诗集乃康公车上书时所作。”(《戊戌变法》(四),第631页)这首诗很可能是后来补作或修改过的。